

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构筑中国管理之基

吴照云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内容提要: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首先要明确其研究对象,即中国文化中“管理”的概念和内涵,该研究的任务是循时间线索去贯穿中国历代思想家针对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管理问题不断思考形成的各种管理的思路、观点和方法,将之整合成有逻辑结构的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的复杂性,以西方理论为主体的现代管理理论框架难以承载其全貌,应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涉及自我管理、家庭和家族管理、经营管理、国家管理和军事管理五大领域,与管理实践涉及的管理主体、管理对象(客体)、管理环境、管理内容与方法和管理目标五大要素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梳理中国管理思想的基本分析框架。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既是历史研究,也是跨文化研究,还是中国管理理论的基础性研究,因此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应当秉持师古而不泥古、古为今用的基本态度,综合史学视角、管理学视角、跨文化视角等多种视角,为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体系正本源、筑强基、开新局。

关键词:中国管理思想史 研究对象 研究框架 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1)09—0005—11

一、引言

虽然学科意义上的管理学发展历程不过百余年,但管理思想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起源。在数千年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们对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管理实践进行了长期思考,不断总结具有民族特色的对于管理活动的哲学认知、实施策略、操作法则,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管理思想遗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学体系,为丰富世界管理学研究积极贡献中国理论与中国智慧,是中国管理理论研究者时代使命。如何构建这一体系,本文认为,对中国管理思想史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组织、协调、决策等思想,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同时也是管理研究者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的一种努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管理思想史就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此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既有对中国管理思想发展史的总体论述(刘云柏,2010^[1];吴照云,2012^[2]),也有对各历史发展阶段管理思想的总结(方宝璋,2013^[3];龚贤,

收稿日期:2021-06-21

作者简介:吴照云,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管理理论、产业组织和战略管理,电子邮箱:wuzy56@

163.com。

2011^[4]),还有关于人性管理思想(周书俊,2011)^[5]、人才管理思想(蔡文,2018)^[6]、战略管理思想(钟尉,2011)^[7]、行为管理(余焕新,2013)^[8]、创业管理(余长春和平飞,2014)^[9]、财政管理等多角度的专题研究(黄文德和方宝璋,2016)^[10]。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本文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其研究对象,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拓展研究视角,明确研究指向。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管理”的概念和内涵

1. “管理”在中西方文化语境中存在差异

首先要明确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中的“管理”的概念和内涵。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但在翻译界,把一种文化下司空见惯的某个概念翻译到另一种文化语境中去时,常常会遇到内涵的偏见与误解。一般而言,大多数翻译都存在着一程度的不准确性,一种文化中的某个词汇,往往很难在另一种文化中找到一个和其意义完全相同的词汇。甚至有人认为,这样的词汇只有不翻译才能保证其概念为另一种文化下的人们所正确理解。事实也是如此,诸如中文中的“风水”“道”等词汇被翻译成英文时基本上就是采取了音译。而反例如,“龙”在中文中是一种神圣的动物,甚至可以算是一种神灵,它拥有各种法力,并主管人间降雨,为人们所喜欢和崇拜,故此,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而在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龙”却被翻译者使用“Dragon”一词来指代,英文中“Dragon”一词对应的是西方人观念中一种邪恶的怪兽,住在山洞里,有翅膀能飞,口能喷火,西方英雄往往以杀死恶龙为伟大的壮举。可以说,这样的翻译不仅不能反映出中国人心目中龙的形象,在把龙的神圣性、高贵性的内涵全部丢失的同时,也毁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中的形象:中国人居然以这样一种邪恶的怪兽当作自己的祖先、作为崇拜的对象,善恶不分。

而对于“管理”这类比较抽象的词汇更是存在翻译问题。“管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活动,但是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对“管理”一词的理解和西方人对“管理”(management)一词的理解却存在巨大差异。在英语中,除了人们最常用的“management”,还有“administration”一词也可以被翻译成汉语词汇“管理”,如法约尔在《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一书中就是使用“administration”表示管理。在管理学领域,一般都认为“administration”是“management”的执行部分,亦或指行政管理,同样属于“management”的一部分。

在西方管理学界,管理定义五花八门,难以给出一个统一概念。经典的管理理论家,譬如泰勒、法约尔、西蒙、韦里克、唐纳利,几乎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观点,尽管可以对这些管理概念界定做一些归类比较,但是想要统一管理概念却难以做到。近年来,国内学者也有意识到这一点,并讨论管理概念的界定问题,指出西方管理学界对管理的定义至今未能统一,主要源于对管理学研究对象的不统一。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三类:组织、管理活动和人(特约评论员,2013)^[11]。第一类研究对象是把组织作为管理研究的基本对象,认为管理是通过调整组织资源,有效果、有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这种观点带来的一个大的疑问就是如果不存在组织,那么管理是否就不存在,独立个人是否可以成为管理的基本研究对象?第二类研究对象是把管理的对象界定为管理活动本身,把管理活动当成与技术、市场、财务、安全、会计活动并列的企业中的一种活动,这种观点把管理从企业(或组织)其他活动中独立出来了,但是在实践中,管理往往难以从其他活动中独立开来。第三类研究对象是把组织中的人作为管理的对象。这实际上是第一种研究对象的狭义化,同样存在相应问题。

2. 从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中国管理”内涵

中国文化和中国管理思想史中的“管理”是什么,可以从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国人的日常语言特点、思维习惯以及中国管理现实中一些特有的现象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首先,从历史文献来看中文“管理”的概念。根据《说文解字》对管理的“管”字的解释,“管,如箎,六孔,十二月之音,物开地牙,故谓之管”。可见,“管”本义是指一种有六个孔的,可以发出特定音律的管状乐器,它发出的声音还有特殊的引申意——“十二月之音,物开地牙”。清代段玉裁解释说,“牙”通“芽”,十一月物萌,十二月物芽,正月物见也。“管”发出的声音象征植物经过了萌发阶段之后,开始从地面上长出嫩芽的过程。可见,“管”象征事物萌发到展现的中间过程,因此,“管”,有促进和协调某种事物向着良好的方向不断前进和发展的涵义。

再看“理”字。《说文解字》说,“理,治玉也”;清代段玉裁解释说,“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玉虽至坚,而治之得其理以成器不难”。他又引先贤的话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是考察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根据其规律采取不同方法使得事物向着良好方向发展的活动。此外,“理”不仅可以指自然事物之理,还可以指社会与人性之理,当“理”是社会与人性之理时,理和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按照“理”来处理与人相关的问题时,要由情人理,不能只讲理性不顾感性。因此,中文“理”字,并非仅仅指理性,它也包含着人的感性在内,即人性的全部。

在日常用语中,中国人提起“管理”,下意识想到的未必是企业管理,可能是政府管理、家庭管理,甚至是对管理主体自身的自我管理,比如“管好你自己”、“管理好生活”、“管理好家庭”、“管理好人际关系”等都是中国人日常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所有可以“管”或者“理”的人、事、物,在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中都可以算管理。这种理解表明,中国人对管理的理解远比西方人对管理的界定要宽泛得多。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可能和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文化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有关。任何文化中,治理国家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一种管理活动,而“修齐治平”在儒家观念中乃是逻辑递进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既然“治国”是管理活动,由于“修齐治平”的不可分割性,那么“修身”、“齐家”和“平天下”无疑也是管理活动,不然,以修身为本,继而齐家,然后方可以治国,最后才能平天下的逻辑就难以成立。因此,我们不能根据西方学者对“management”的定义,说自我管理、家庭管理、人际关系管理等活动不能算管理。虽然自我管理、家庭管理、人际关系管理等活动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management”,但它们一定是中国人心中的“管理”。因此,中文的“管理”内涵远比“management”的内涵更丰富。

从中国管理现实来看,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管理面临着许多西方管理实践中没有的特殊问题,比如近几年来管理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关系”。西方人也发现中国人的关系远远比西方人复杂,不可以用“relationship”或其他的英文单词来表示中国人的关系,于是在英文管理文献中就有了专门对“guanxi”的研究。研究者发现中国人往往将建立各种“关系”作为做人做事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关系”面前,组织中的许多规章、制度由刚性变成了柔性,甚至由柔性变成了“虚设”。在强大的关系网络中,甚至组织本身在中国人眼中也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如果个体在组织中不能融入一个关系网络中或者个体自身已经拥有了一个强大的个人关系网络,而这个关系网络和组织缺乏足够的交集时,那么个体就不会对组织产生归属感,也不会为了组织目标而努力工作。

再譬如,中国人中庸的态度、面子问题等,都是中国管理实践所必须面对的,而西方管理理论却很少涉及。这些中国管理实践特有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和人的思维方式和群体生活习惯有关,集中体现在管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和互动中,管理概念中如果缺乏这些内容,将会造成管理理论解释力的削弱。

西方管理理论源于西方的企业管理实践,对“management”的研究最初就被局限为企业这种特殊的组织中,后来才向一般组织拓展,因而西方管理理论始终带着企业管理的烙印。企业最关心的是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和如何提高市场竞争力,因此,追求经济效率和赢得市场竞争地位被认为是管理活动最重要的目的。为此,他们提出了系列假设、工具、方法和理念,从而形成了一个管理理论。无论是科学管理理论、人际关系学派、系统管理理论、战略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等,几乎所有的西方管理理论中所有的方法和理念都指向经济效率和市场竞争。简而言之,在西方管理学中,管理乃是针对以企业组织为原型的管理,管理中涉及到人,基本上是在企业组织工作的人,当他们的行为会影响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时才会被关注,而这些人在组织之外的生活则是鲜被关注的,如个人的家庭生活、人际关系、伦理道德、价值观乃至人生终极问题等都不是西方学者们主要关注的对象。

而中国的管理思想最初源于对人生的思考,包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和对整体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思考,因此人自身的价值追求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中国管理思想永恒的主题。为了解决人生价值追求问题,中国的古圣先贤们通过内心修行来提升智慧和境界,遂根据他们自身体悟,提出基于圣贤智慧的管理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化解烦恼、追求幸福”。因此,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很少看到有如何提升效率、提高竞争力的观点,更多是各种伦理道德和人生观、人生境界与修为功夫的思想。从哲学上来看,人生价值追求和社会价值本质上是伦理问题,因此,在中国古人看来,构建积极合理的伦理体系解决人生问题才是管理活动的根本目的。效率仅是目的之一,或者是一个为伦理目标服务的手段。

因此,中文“管理”的概念涉及所有人类的实践活动,其内涵远远超过“management”,只要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人、事、物,都可以成为管理的对象,如个人身心、人生规划、人际关系、家庭成员、社会群体等都可以成为管理的对象。

综上所述,“中国管理”不能简单地看成由“中国”和“管理”两个词汇构成,而应该把中国管理的概念看成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概念,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概念。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直接套用西方管理概念去框定中国文化中的管理和思想,就会破坏中国管理思想内在的逻辑性,将中国管理断章取义乃至面目全非,最终把博大精深的中国管理思想变成西方管理思想的注解和案例。

三、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视角

1.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中国管理思想史

在界定了“中国管理”概念的基础上,需进一步界定中国管理思想史的概念。“史”就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历史流传下来的典籍资料的分析梳理。

“史”有“通史”和“断代史”之分。“通史”即贯通的历史,即按照时间顺序来贯通一个国家或地区或世界的从文明诞生至今的历史,属于跨时代式研究,不间断地记叙从古至今的历史事件。断代史正好相反,是限于某个时代的历史。

我们还有必要就“思想”和“思想史”这两个概念做一个探讨。钱穆曾在《中国思想史》中谈到自己对于“思想”“思想家”“思想史”以及派别的看法:“思想”就是关于一个问题长期且毫无杂念的思考;所谓的“思想家”则是能对一类事实或一个问题,穷年累月,甚至穷其一生不断思索的一些人;后人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扩大深入,便成为了思想史(钱穆,2012)^[12]。张岂之先生就思想史研究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社会变动决定着思想内容的变化,而新思想的出现又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或阻碍社会发展,这就要求思想史的研究者需要从历史上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多个方

面去探索思想意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第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思想内容”,这是思想史的一个范围界定;第三,思想史的研究应注意思想源流的演变(张岂之,1983)^[13]。

综上,中国管理思想乃是中国历代思想家们针对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管理问题不断思考形成的各种管理的思路、观点、方法总和。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即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观,依照时间线索,去贯穿理解中国历代思想家针对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管理问题,不断思考形成各种管理的思路、观点等,使之形成一个有逻辑结构的思想体系的研究。

中国管理思想研究也是一种诠释学的研究。要正确而全面地把握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深刻内涵,就涉及如何对中国古代管理文献进行诠释。中国古代管理典籍的语言不仅和现代管理语言存在极大差异,且其中多有言约意丰的词汇和概念,必须对其进行诠释,分析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结构,用以明晰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与联系,以求正确把握其内涵。

特别地,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还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研究。类似于质性研究方法中倡导的田野研究,需要研究者亲身去操作,进行直接的观察和体验。例如,中国古代管理中的修身思想,如果研究者纯粹从文献出发就事论事,而缺乏自己亲身对修身思想的践行,那么无疑是纸上谈兵,也无法判断各修身方法的优劣。

2. 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三种视角

研究视角指的是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为达到或接近研究对象以获取真相所采用的基本立场与方法。研究视角与研究目标或意图紧密相关,不同的研究视角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为了全面认识研究对象的多种面向,研究过程中往往需要综合多个研究视角。

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不仅仅是历史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研究和中國管理理论的基础性研究。该研究不仅强调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演化规律的分析与探讨,更强调从管理学学科架构去分析中国管理思想,发现其内在的逻辑规律与当代主流管理理论之间的差异,为创立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提供重要支撑。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不仅会涉及到对中国管理思想在时间、人物、学派等线索的发展与比较,而且还会涉及到中外管理概念的差异比较,以及管理学和历史学之间学科架构和基本逻辑的冲突与整合。因此,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需要综合史学视角、管理学视角、跨文化视角等多种研究视角。

(1)史学视角。学科的史学研究是从根源上探索其发展源流,历史中潜藏着解决理论难题的线索。这是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必须以历史研究作为支撑的基本原因。由于各阶段社会环境、社会规模、经济水平等的不同,先后出现不同的管理思想。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史学视角是将古代管理文献视为确定的历史事实,通过研究者的工作还原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环境、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作为一种历史研究必须以时间、事件、人物作为线索,或以各学派的发展历程为依据,从历史文献本身提供的证据出发,依照社会经济文化及组织制度历史演变的脉络,研究它们的产生、发展与演变过程。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史学视角的研究必须探讨中国管理思想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研究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揭示中国管理思想与中国古代文明高度发达之间的关系。

(2)管理学视角。管理学视角研究也是中国管理理论的基础性研究。这项研究强调从管理学学科架构去分析中国管理思想史,发现其内在的逻辑规律,为创立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提供重要支撑。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管理学视角将中国古代管理文献视为特定的管理思想体系,从管理学的学科范式对其进行研究。管理学视角的研究主要回答如下问题:中国管理思想中不同的管理对象对管理理想、管理境界、管理目标、管理原则、管理方法和手段等产生了何种影响?针对不同

管理对象,管理思想有哪些学派,每个学派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遵循何种逻辑?这些管理思想的具体内容与当时的管理环境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管理主张有哪些变化,这种变化背后的演化规律是什么?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管理思想在整个社会管理思想体系中地位如何,它们如何作用于各种管理对象,具体效果如何?

(3)跨文化视角。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跨文化视角将中国管理思想视为人类有目的的思维活动的一部分,和西方管理思想一样,都是人类管理思维活动的集中体现。跨文化视角是通过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产生的管理思想、管理模式以及管理效果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和比较,探讨它们之间的异同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理论实践的可转移性。跨文化视角通过内容分析与哲学思辨的方法,探究中国古代管理文献的思想意涵及其文化源流,比较其与西方管理思想之间的差异,主要回答如下问题: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古代管理文献产生的文化背景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反映了何种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和西方管理理论相比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源泉是什么,它受何种哲学思想影响,这种哲学思想和影响西方管理理论的哲学思想有什么差异?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和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和演化过程有什么差异,这种差异对中西的管理实践产生了何种影响?

四、通过中国管理思想史构建中国管理之基

1. 中国管理思想体系的基本分析框架与内在逻辑

葛兆光先生指出,思想史的写法与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密切相关,观念、思路不同则写法不同(葛兆光,2004)^[14]。要写中国管理思想史,就必须首先确定按照什么线索来写。管理思想(理论)可以作为一种哲学范式来看待。西方哲学基于本体论和认识论展开,形成了主观与客观、变化的实时性与规律的科学性两个维度,因此,具化至管理领域,早期研究存在两种极端,或单一强调管理环境,如规则制定,或者单一强调人,如管理者的计划性与领导力。中国哲学涉及对“天道”“人性”“礼”的认识,发展时间较长,难以通过维度划分进行归纳。中国古代管理的“复杂性”体现在管理认知的复杂性、管理情境的复杂性、管理对象的复杂性等,若完全基于西方现有管理框架为视角进行研究,如管理的四大基本职能,无法从漫长的中国管理思想史中汲取经典。

从研究现状看,部分学者借鉴西方管理学理论体系,并以此作为基础来研究中国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也有一些研究者从中国管理实践自身特点出发,构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体系。如胡祖光先生从中国历代管理思想家的著作和管理实践家的实践中归纳出“管理者13要务”:用人、治法、纳言、决策、组织、激励、指挥、处事、考核、变革、修身、廉政、教化(胡祖光,2019)^[15]。又如以苏东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构建了“三为四治五行”体系(苏东水,2005)^[16]。还有一些研究者则是采用学派研究的方式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直接进行研究:如刘云柏在《中国管理思想通史》中将中国管理思想分为儒家、道家、法家、佛家、兵家、墨家、农家、阴阳家、杂家、名家、基督教、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纵横家、医家等派别,并分别加以历史性考察(刘云柏,2014)^[17]。

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基本分析框架的建构,关系到对中国传统管理哲学逻辑的理解和对管理思想的总体把握。目前这方面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认为,构建这个基本分析框架,需要做到两点:首先,需要根据前文对中国管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和中国管理思想的界定来设计,保证运用这个基本分析框架归纳梳理出的思想是镶嵌在中国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其次,作为管理思想通史,仅仅依靠时间线索不足以形成一个有逻辑结构的完

整思想体系,因此有必要去寻找其他可以贯穿整个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线索。如孙隆基先生指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一直存在以“心心相印”去组织“身体活动”以实现“戮力同心”的超稳定倾向,从封建时期的“民本思想”到中国化后的马克思主义皆是如此(孙隆基,2015)^[18],若我们能够在保证中国管理概念视角的同时,找到多条贯穿整个中国管理思想的线索,就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梳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的管理思想。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合一基本特质的表现,中国管理从实践形态上来说必然具有人类有目的实际活动的所有要素,即实践的主体、对象(客体)、环境、内容与方法和目标等要素。也就是说,研究中国管理思想一定要研究管理主体、管理对象(客体)、管理环境、管理内容与方法和管理目标五个基本要素。因此,管理主体、管理对象(客体)、管理环境、管理目标、管理内容与方法等管理实践的五大基本要素必然要纳入梳理中国管理思想的基本分析框架中。

中国管理思想史中的管理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事务管理,追求有效完成特定的事务,这是西方管理理论关注的重点。事务都有其客观规律,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管理事务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因此,无论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还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只要是要有效完成同一事务,都存在若干可以选用的有效方法和流程,只要把人管好,就能有效完成该事务。对事务管理本身不受文化影响而受到具体执行事务、管理任务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影响,因此中国管理思想在事务管理上与西方管理思想并无本质差异,只是因为具体从事事务管理的管理者差异而有变化。二是个人素质,这是中国管理思想的特色,也是儒家管理思想中“修身”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对心灵的管理、对身体的管理、对人际关系的管理和对人生的整体规划与管理等。“修身”是整个中国管理思想体系的基础,是中国古代其他管理思想的出发点。正如《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离开“修身”,中国古代的其他管理思想都会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三是构建和优化群体秩序,这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家庭和家族的管理、经营管理、国家管理、竞争管理(军事管理)等。

综上所述,中国管理思想史关注的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自我管理、家庭和家族管理、经营管理、国家管理和军事管理。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具有一种由内向外不断拓展的逻辑性,即以自我为核心,管理者首先进行自我管理,做好自我管理、提升个人素质,然后向外拓展,对家庭和家族进行管理,家和邻睦再向外拓展,就能进一步做好经营管理和国家、社会管理,组织内部经营管理和国家、社会管理得当才有参与外部激烈竞争的基础包括军事管理和企业竞争管理。一言以蔽之,自我管理——家庭和家族(团队)管理——经营(有序竞合)管理——国家(组织)管理——军事(无限竞争)管理五方面内容,就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通史涉及的五大领域。

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涉及的五大领域和管理实践的五大要素结合起来,可以组成一个梳理中国管理思想的基本分析框架。这个基本分析框架由两个基本内容构成:一是时空线索,即管理思想产生的时间线索和管理思想涉及的空间领域;二是管理实践要素线索,即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目标(境界)、管理环境、管理内容与方法。沿着时间发展顺序对每个时代的中国管理思想涉及的每一个空间领域都根据管理实践的五大要素进行细分,使用统一的分析框架梳理各个朝代的管理思想,把各个朝代的管理思想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有逻辑结构的完整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既具有中国管理视角、管理实践要素,又有贯穿整个思想体系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线索,符合前文对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界定,能够保证研究成果是一部相对完整的中国管理思想史。

2. 中国管理思想史中“管理”涵盖的主要领域

中国管理思想史中“管理”涵盖的第一个领域是“自我管理”。从字面上看,很容易认为自我管理的管理主体和客体都是自我,但是,实际上自我管理的主体只能是人们内心可以自主的力量。严格来说,就是人们的自由意志和理性,离开了自由意志和理性,自我管理是不可能进行的。而自我管理的客体包括个人的内心、身体、生活、人际关系与发展规划等,且可以进一步细分。因此,自我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管理活动。

自我管理的管理目标总体上追求个人或群体的幸福或利益的最大化,具体是重点追求个人的幸福或利益的最大化还是群体的幸福或利益的最大化,幸福或利益的最大化该如何计算,中国古代不同的思想学派有很大的差异:儒家自我管理追求的是自我道德境界和素质提升,为内圣外王提供基础;佛家自我管理追求的是超越生死、获得永恒的快乐。自我管理思想在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大学》指出,“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我管理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来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根基。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思想家及流传千古的经典著作,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对自我管理思想的探究。

在自我管理这个领域中,对个人内心的管理是核心,也是全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受到了儒家、道家、佛家等文化流派的普遍重视。对个人内心的管理包括做心性修养功夫和个人道德素质提升。心性修养功夫比较复杂,按古圣先贤的观点,一个人做好心性修养功夫,不仅可以提升智慧、减少烦恼,还可以提升生命境界、成就圣贤人格。因此,心性功夫是成就内圣外王的人生事业关键。而个人道德素质的提升,则需要个人对自己的私心和欲望进行观察和反思,减少私欲、控制私心,从而提升道德水平和人生境界,严格地说个人道德修养也属于心性功夫的一部分。

第二个领域“家庭和家族管理”。即对家庭和家族进行管理。家庭是指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生活单位,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制度和群体形式,承担儿童社会化、供养老人的责任。家庭和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的基础。家庭管理的主体是家长,管理的客体是家庭成员,家庭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家庭关系和谐。家族管理的主体是族长,管理的客体包括族人、族产和相关家族事务。家族管理的基本目标是追求家族繁荣昌盛。我国古人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特别是子女的德行教育。古代家庭品德教育教子做有德之人,教子孝敬父母,教子俭朴为美。家庭管理问题是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组织中的管理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家庭方面的影响。由于文化积淀,家庭家族观念今天依然以某种形式存留在中国人的思想中,组织管理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家族管理思想中找到解决办法或者参考措施。

第三个领域“经营管理”。这个领域包含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和商人微观经济管理两个层面。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活动包括土地、财政、货币、赋税、市场价格、农业、工商业等相关的管理政策与措施;商人微观经济管理活动主要是他们的发家置业活动。我国古代管理思想中有着丰富的经营管理成分。中国古代理财家不可胜计,诸如管子、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杨炎、王安石、张居正等超然卓著的理财思想灿若星汉,在货币、物价、税收、市场、土地及粮食储备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在富国与富民、生产与消费、伦理与经济、奖励与惩罚等方面都有深入的思考(张岂之,1983)^[13]。这些对今天的国民经济的管理依然有借鉴价值。中国古代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富国富民,在农业经济管理方面,力求保证使劳动力和土地结合,督促和组织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保护生物资源及救荒措施。在工商业方面,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力控制管理,制定国家政策

影响经济活动以及通过商品货币关系管理国家经济。古代没有留下一本关于自由商人的微观经营管理的专著,相关思想分布在历代经史百家学术论著中,其中不乏深刻的管理智慧。关于家庭理财,祖先留下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以德理财,树德持家;勤俭持家,开源节流;注重积累,计划生活等。古代经营中还有个重要角色就是古代商帮,为现代经营管理留下不少值得总结的经营策略。

第四个领域“国家管理”。即管理整个国家的日常事务。国家管理的主体是各个管理机构的管理者。一般来说,国家管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外交与军事等,重点是国家的内部管理活动,即政治管理和社会管理。国家管理的总体目标是国家实力不断提升,稳定和富强。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包括政治、经济、人才管理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摸索,总结治国之方、君臣之道,提出诸如因时而立政令、礼义法度应时而变、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食货为生民之本、以教化治天下、严格吏治及交邻有道等系统的治国方略。

第五个领域“军事管理”。这个领域包括对军事组织(军队)与军事活动(军事竞争)的管理。军事管理的主体有君主和将领,管理客体包括将领、士兵、后勤装备、情报信息等方面。军事管理的总体目标包括防止战争爆发、对付潜在危险、获取竞争胜利等。中华民族历史中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层出不穷,其军事管理思想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一大亮点。相关代表著作诸如《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和《司马法》等,无不闪耀着杰出的军事管理智慧与光芒。我国古代许多军事著作中的理论都可以上升为哲学,蕴含着丰富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等,对敌我、奇正、虚实、攻守、进退、围阙、迂直、主客、勇怯、长短、吉凶、利害、众寡、强弱、逸劳、胜败等对立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关系有着深刻认识,“以谋制胜”的史例数不胜数,从遵循商业伦理的“义战”角度来看,诸多谋略对当今管理活动具有借鉴价值。

五、管理思想古为今用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

研究中国管理思想应当秉持师古而不泥古、古为今用的基本态度。“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难题都可以从历史中寻觅源头、探索思路。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的着眼点一是为理论创新提供素材,二是为当代管理实践提供借鉴。

我国管理学学科体系基本沿袭、借鉴西方管理学体系,由于我国文化传统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时有“水土不服”。管理学科发展历程表明,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走向世界前列时也就会产生具有民族特色并具世界意义的管理理论创新。美国崛起时的科学管理和组织革命,二战后日本经济奇迹中出现的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工会为核心的日本管理模式都被世界管理学界认可。当前我国已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的工业大国,构建中国本土的管理理论已成为学界的呼声。在任何一门学科研究中,史学研究都有基础性,任何理论问题都可以从学科史上溯源并揭示理论内涵中的本质问题,把握这一理论的历史成因及历史进展,这便是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必须以历史研究作为起点的基本原因。

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也可以为中国当代管理实践服务。当代中国处在一个转型社会,中国社会要实现成功转型,不仅要借鉴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经验,更应该吸取祖先的智慧。中国古代国家管理思想可以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参考、为中国当代企业管理实践提供借鉴。另外,中国当代社会价值观迷失、道德沦丧等诸多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和传统的自我管理、家庭管理思想传承中断有关,而研究中国古代自我管理思想可以提升道德素质、推动自省反思、提升人生境界。在家庭家族管理领域方面,一方面,家庭管理问题是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组织中的管理

工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家庭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虽然现代中国人家族观念有所淡薄了,但类家庭组织仍然存在,比如当代的家族企业其面临的管理问题可以从中国古代家族管理思想中找到解决办法或者参考措施,并且中国古代的家庭、家族管理思想可以启发现代管理者更好地维护组织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归属感、增强组织凝聚力。

要做到中国管理思想的古为今用,还需要解决一个古代管理思想的现代传达问题。冯友兰说,“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冯友兰,2013)^[19]。也就是说,写史有三个特点:一是要对于史料十分熟悉;二是懂得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进行选择加工;三是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写中国哲学史如此,写中国管理思想史亦如此。中国古代语言具有独特的表意性、灵活的构词性,与现代汉语有较大差别,难于转换,这可能造成中国管理思想史撰写的相当难度。如果过于追求文本主义,有可能会陷入自说自话;过于注重运用现代的理论框架,有可能会出现削足适履。中国管理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如何与现代管理理论对接,从思想领域的语言说,就是如何不套用以西方理论为主体的框架来阐释传统,又不拒绝源自西方的现代词汇。出路只能是:在使用现代管理语言诠释的同时,注意这些词汇、概念使用到中国文化上可能存在的局限和缺失,并通过对中国管理思想要义的把握用现代语言还原历史原貌与思想精髓,用中国语言延伸西方概念内涵与理论边界,做好古今融通、中西互释的中国管理思想史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我辈同仁关于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创新性研究正是管理学者对时代使命的履行。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研究中国管理思想史,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才能实现对“管理”内涵的正本清源与“管理”思想的古为今用,夯实中国管理之基、服务世界管理之林。

参考文献

- [1]刘云柏.中国管理思想通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2]吴照云.中国管理思想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 [3]方宝璋.先秦管理思想[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
- [4]龚贤.秦汉管理思想[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 [5]周书俊.先秦管理思想中的人性假设[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 [6]蔡文.儒家人才管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8.
- [7]钟尉.兵家战略管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 [8]余焕新.儒家行为管理思想探析——中西比较的视角[J].南昌:当代财经,2013,(5):82-88.
- [9]余长春,平飞.儒家创业管理[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
- [10]黄文德,方宝璋.略论苏辙的财政思想及启示[J].南昌: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6,(4):93-100.
- [11]特约评论员.再问管理学——“管理学在中国”质疑[J].武汉:管理学报,2013,(4):469-487.
- [12]钱穆.中国思想史[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13]张岂之.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J].北京:哲学研究,1983,(10):65-69.
- [14]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 [15]胡祖光.东方管理学[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9.
- [16]苏东水.东方管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17]刘云柏.中国管理思想通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18]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 [19]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Constructing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Management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U Zhao-yu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anagement in the disciplinary sense is only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old, management though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origin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for thousands of years, people have carried out long-term thinking about the management practice with the natural economy as the main economic form and the family as the basic production unit, and constantly summarized the philosophical cogni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management activities, thus forming a rich legacy of management thoughts.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oughts, and digging into the ideas of organization, coordin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 is a basic work for constructing a managemen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an effort for management researchers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well and strengthen thei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ought, we must first clarify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management” in Chinese culture. The task of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ought is to follow the clues of time to run through the various management thoughts, viewpoints and methods formed by Chinese thinkers in various management issue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a logical structure of thought system.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ancient Chinese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management thoughts, the modern managem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 Western theories as the main body cannot carry its full picture.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management thought involves five major areas: self-management, family and family management, business management, state management, and military management. The above five fields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five elements of management subject, management object, management environment, management content and methods, and management objectives involved in management practices to form a basic analysis framework for combing Chinese management thinking.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ought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ary laws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ought, but also emphasizes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ought from the management discipline framework, and find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ts inherent logic rules and contemporary mainstream management theories.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creation of China's own management theory. “Take history as a mirror to know the rise and fall”, many problem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an be sourced and explored in history. On the one hand,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ought can provide material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practice.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ought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study, but also a cross-cultural study, or a basic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eory.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ought should adhere to the basic attitude of learning from the past without diminishing the past, and applying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integrating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and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Moreover,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ought needs to start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explore the management wisdom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original and clear source of the connotation of “managemen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anagement” thought to the present, and to build a management theor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style.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 thought; research object; research framework; research perspective

JEL Classification: M0

DOI: 10.19616/j.cnki.bmj.2021.09.001

(责任编辑: 闫梅)